

現代新儒學研究叢書

方克立·李錦全 主編



本体与方法

—从熊十力到牟宗三

● 郑家栋 著

● 辽宁大学出版社

90042

●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

方克立·李锦全 主编



200108132

本体与方法

——从熊十力到牟宗三

郑家栋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年·沈阳

(辽)新登字第9号

本体与方法

——从熊十力到牟宗三

郑家林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插页:2 字数:260千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责任编辑:刘万泉 封面设计:安今生
赵光輝 责任校对:刘丽萍

ISBN 7-5610-1823-1
B·92 定价:7.50元

丛书主编的话

这是一套以现代新儒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丛书。

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文化之慧命自任的知识分子，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建构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它主要是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同时也包含着社会政治的内容。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派，七十年来它已有三代人薪火相传，形成了自己的学脉和传统，至今仍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就包括港澳台在内的整个中国而言），现代新儒学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鼎立的三大思潮之一，很有必要对它进行认真的深入的研究。

关于现代新儒学的前期发展，贺麟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论著中已经作过初步的清理和总结。现代“新儒家思想”、“新儒学运动”等概念就是贺先生最先明确提出来的。

1949年以后，现代新儒学宗师熊十力先生的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在港台继续大力推进新儒学运动，他们的著作和思想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1972年，美籍华裔学者张

瀛写成《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最早刊出于1976年出版的英文论著《变革的限制——论民国时代的保守主义》中)一文，开始从总体上对现代新儒学这种思想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他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来对新儒学进行反省的，但并不只是简单的批评与否定。同样站在自由主义立场的台湾学者韦政通，这一年也撰有《现代中国儒家的挫折与复兴》一文，对现代新儒家的一些主要思想观念进行了批判的审视。把现代新儒学作为一个专门对象来进行研究的学术工作，在港台、海外可以说从七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

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起步要晚得多。八十年代中期，杜维明等海外华裔学者大力宣传“复兴儒学”和“儒学第三期发展”的主张，在文化讨论中俨然成为了一派显学，大陆学界才对现代新儒学（特别是五十年代以后它在港台和海外的发展）逐渐有所接触和了解，并开始对它进行研究。1986年11月，“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被批准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之一，对这项研究工作是一个极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课题组成员不得不从搜集、阅读最基本的图书资料开始，包括几代新儒家学者的著作和海内外的有关研究资料，任务相当艰巨。我们在“七五”期间完成的一项主要工程就是编撰《现代新儒家学案》(上、中、下三册)，同时编辑出版了一套《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共十五册)，首先把克服种种困难多方搜集来的基本资料加以初步整理，比较系统地介绍给国内的读者。研究工作是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逐步开展起来的。在过去几年里，课题组成员除了已经出版《现代新儒学概论》(郑家栋)、《现代新儒家研究》(宋志明)、《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郭齐勇)、《冯友兰新理学研究》(田文军)等几部专著外，还在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了近二百篇论文(包括收入

《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第一、二集中的文章)。这些初步的研究成果,不仅改变了大陆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学完全隔膜的情况,而且引起了港台、海外学者的密切关注和重视,甚至连新儒家学者也惊异地发现:“有些我们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却先做了”,并以“我们也要加紧做,不要放弃自己的责任”自励。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因此而有了较好的基础和条件。

撰著和出版一套包括专人研究和专题研究两个系列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是课题组下一步研究工作所要达致的目标。专人研究系列是对第一、二代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新儒学思想,分别进行系统地研究和评述,重点是研究他们的古今、中西文化观和哲学、宗教、伦理思想;对于那些活跃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则需同时注意研究他们的现代儒家政治思想。总之,既要揭示他们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共性,也要写出每个人思想的个性。专题研究系列是对现代新儒学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分别专门研究。例如对其哲学本体论、方法论、历史观、宗教观、伦理观、人生哲学、文化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等等,运用逻辑和历史一致的方法,分别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和阐论。又如对现代新儒学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学说的承继渊源关系或对立互动关系,分别加以系统地考察,也可以作为专题研究的内容。这两个系列的论著都要求把研究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深入,加强理论分析,总结对现实有启迪的经验教训。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写成和出版,能把国内的现代新儒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需要说明的是,承担《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写作任务的,大部分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优秀中青年学者,有的还是在读博士生(他们承担的研究课题往往就是他们的博士论文选题)。青年人精力充沛,思想敏锐,勇于开拓进取,富有探索精神,所

以这一批研究成果大都各有创新见解，不落俗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课题组始终十分强调两点：一是要详细占有资料，准确理解原意，这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的基础和前提；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现代新儒学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评论，既不盲目崇拜，也不抹煞它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所有作者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去做。应该说他们的工作是做得有成绩的，基本上达到了上述两个要求。但是也不必讳言，由于各位作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学识水平不同，研究能力和所下的功夫不同，各册论著的水平也难免参差不齐，不成熟或不完善的地方，甚至错误失当的地方，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们恳切地期望得到专家、读者的批评指正，让这套丛书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也有利于锻炼造就一代学术新人。

天津人民出版社和辽宁大学出版社分别承担了本丛书的专人研究系列和专题研究系列的出版任务，给我们的工作以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方克立 李锦全

1991年12月10日

序

唐力权

郑家栋是我1990年暑期在南开大学讲学期间结识的年轻朋友。他来听我的讲座，并常与我讨论问题，我注意到他不仅思想敏锐，且对中西哲学都有很强的理解力。当时他的《现代新儒学概论》一书刚刚出版，又在研读牟宗三先生的著作，构思他的博士论文，并已形成有关牟氏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他曾与我谈到：牟先生从道德实体“不受限制”的属性出发，思辨地证明道德实体即是宇宙实体，在方法上很近于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这确实是新的东西，因为传统儒学说明道德与存在的关系从不是思辨地（而是实践地）讲，但此种论证的可信性显然大可怀疑。在本书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此问题的系统阐述。

在南开大学讲学期间郑先生与我谈的最多的还是我的《周易与怀特海之间》一书。他对我建构场有哲学的理路和方法有浓厚的兴趣，表示要撰文作一评介。我离开大陆数日在香港逗留期间，即收到他寄来评介拙著的万字文稿，拜读之后，我对他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一部观念繁复、内容玄思曲奥的学术著作把握得如此准确和阐述得如此清晰明了，颇感惊异。

郑先生在新儒学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主要得力于他的研究的独创性和系统性。在完成于1989年初的《现代新儒学概论》一书中，他提出一套系统的观念诠释新儒家的思想

学说。作为海内外第一部系统研究新儒家的专论性著作，该书对推进此方面的研究起到了无庸置疑的重要作用（大陆和台港学界对此都多有评论），郑先生也因此成为该领域的权威性学者。上次在大陆停留不算长的时间里，就曾数次听人提到郑先生文章写得好，年轻学人则佩服他思想的深刻和富于思辨性。有人说他的研究工作的意义不限于新儒学领域，这大约是指研究方法的改进而言。

郑先生在《现代新儒学概论》书中认为：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是新儒家全部理论的核心和出发点。读者将看到的这部书，则是在前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研究新儒家（熊、冯、牟）三个最富代表性的形而上学体系。比较而言，前书更注重从总体上把握新儒学的基本精神和逻辑发展，本书则更多深入具体的分析。例如：书中冯友兰部分“新理学的基本精神及其限制”一节的分析极富创见，所论问题可以说《概论》书中均已涉及，本书则有系统精到的阐发论述。

《概论》书中对港台唐、牟等人的研究相对薄弱，本书中牟宗三部分则占全书近一半的篇幅，所论范围涉及牟先生所有主要的著作，可以说是目前所见到的此方面研究最系统的成果之一，尽管郑先生申明还“只是初步的研究”。

本书对牟氏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牟先生有关道德与存有、有限与无限之关系的说明，尤其是阐明了牟如何用儒家特别是陆王心学的心体性体概念改造康德的自由意志概念，将康德作为理性理念的自由意志（实践理性）实体化、本体化，使之成为一个“普遍的、绝对的、贯通道德界与存有界的、决定一切创造一切的、无所不在亦无所不能的形上实体”（参见本书第四章“道德的形上学检讨”一节）。书中认为：在这一点上牟已由康德走向了黑格尔，而所谓“实践理性充其极”（道德理性

无限扩张)的思路则是儒家而非康德的。

书中认为，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路所以不通畅，乃是因为他们对人的存在的有限性方面(即人性与神性的差异性方面)仍然缺乏应有的重视。在讲“无执的存有论”的同时讲“执的存有论”，是牟先生进于传统儒学之处，但把执的存有论套在佛家的“遍计所执性”中来讲，就使它的认识论意义大为削弱。郑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及：我在《周易与怀特海之间》一书中“关于表现‘材知爱欲’的爱罗心性的作用与地位及其与良知仁性的互补关系的论述”，对他的思考“颇具启发意义”。如何真正认识和说明“不仅道德心性(良知)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合理的感性欲求同样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在肯定与人的感性存在相关联的“材知爱欲”(爱罗心性)的创造性作用的前提下，建构一种我称之为“仁材并建”的心性论，这确实是新儒学未来发展中一个富于挑战性的问题。

作为新儒学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郑先生此部新著定会对推进和深化此项研究起到重要作用。据言此书的责任编辑即是我《周易与怀特海之间》一书大陆版的责任编辑赵光辉先生，我也对他在学术著作的出版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如此热心于高层次学术专著的出版，甚感赞佩！

1991年12月

目
录

导论 意义的危机与形而上的追求

第一章 探求真实的存在：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一、思想特质与学思历程	11
(一)“不是为专家之业”	11
(二)援佛入儒，归宗于《易》	14
(三)新儒学体系的最终完成	21
二、哲学与科学的划界：哲学就是本体论	26
(一)哲学与科学宜“分其种类，别其方法”	27
(二)不可“把真和善分作两片说”	31
三、“以体用不二立宗”	36
(一)体用与有无	38
(二)体用与“亲与子”	42
(三)体用与动静(翕辟)	46
(四)“混真俗为一谈”	51
四、儒家心性本体论的重建	55

(一) 体用与心性	55
(二) 个体之心与宇宙之心	58
(三) 本心即本体	64
(四) 性智统辖量智	73
(五) 梁、熊心性论之差异	76
五、“性、量分途”的哲学方法论	80
(一) 科学方法与玄学方法	80
(二) 表诠与遮诠	85
(三) 理智与超理智	88
(四) 体用不二与性修不二	92

第二章 分析的玄学：冯友兰的新理学

一、从哲学史家到哲学家	97
二、“贞元六书”的逻辑结构	103
三、运用逻辑分析方法重建儒家的形上学	112
(一) “形上学是不能推翻底”	112
(二) 实际与真际：“理世界”的新论证	120
(三) 对程朱理气说的改造	129
(四) 改造程朱理学的意义	136
四、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	145
(一) 立德、立功，也要立言	145
(二) “对于经验作逻辑底释义”	148
(三) “烘云托月”的负的方法	156
1. 直觉是方法，亦或只是一种经验	156
2. “讲形上学不能讲”	161
3. 负的方法评析及其与梁、熊的比较	166
五、新理学的基本精神及其限制	170

(一)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的结合点	171
(二) 新理学体系的逻辑发展与内在矛盾	177
(三) 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接着宋明理学讲：义 利之辨与人生境界说	184
(四) 接着冯先生讲	193

第三章 陆王心学的现代形态：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上）

一、思想分期与主要著作.....	199
二、“本中国内圣之学解决外王问题”	205
(一) 新外王是儒家人文主义现代发展 的中心课题	206
(二) 儒家内圣之学开出科学与民主是 可能的吗?	208
(三) 儒家内圣之学如何开出科学与民 主?	211
三、疏解儒释道三教义理.....	214
(一) “境界形态”与“实有形态”	215
(二) 天台宗代表佛教传入中国后之 “最后的消化”	216
(三) 朱子是“别子为宗”	218
四、儒家道德的形上学之发展历程与基本精神.....	221
(一) “道德的形上学”之界定	223
(二) 从原始儒学到宋明新儒学	228
(三) 儒家道德的形上学的基本精神	235
1. 即内在即超越	235
2. 即存即活动	239
3. 即道德即宗教	246

第四章 陆王心学的现代形态：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下）

一、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及其意义	251
(一) 物自身是“价值意味的概念”	252
(二) 康德只知物自身的消极意义	259
二、智的直觉与中西哲学的划界	265
(一) 人类何以不能有智的直觉	266
(二) 智的直觉之思辨的证立	270
(三) 智的直觉之实践的证立	274
三、从康德的实践理性到儒家的心体性体	279
(一) 康德哲学的“良心”与儒家哲学 的“良知”	282
(二) 自由意志与神圣意志	285
(三) 道德的自觉与自愿	288
四、两层存有论	291
(一) 存有论层次的区分	291
(二) 无执的存有论	297
1. 接着康德讲	298
2. 价值的形上学	303
3. 实践的形上学	306
4. 超越的形上学	311
(三) 执的存有论	314
1. 知性的存有论性格	314
2. 良知坎陷与“识心之执”	318
五、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检讨	329
(一) 道德的理想主义及其限制	329
(二) 道德的形上学检讨	340
1. 道德实体与宇宙实体：一个关于上帝	

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340
2. 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价值取向上的偏失	346
3. 从道德实践到社会实践：传统哲学精神的 继承与转化	350
后记	357

导论 意义的危机与形上的追求

无论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主要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想文化派别和学术思潮之间的分野，还是保守主义阵营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都是基于他们对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或者说我们民族苦难的生命历程的不同感受和认识。正是此不同的感受和认识决定了他们对于传统的态度、认同于传统文化的角度和层次和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所采取的回应方式。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现代新儒家学者倾向于从意义的层面来理解和把握我们民族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文化危机，并确信只有通过对形上意义的追求和探索，重建国人的终极关怀和价值信念，才能从根本上使我们民族摆脱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又都有待于发掘和弘扬传统儒学的基本精神，重建儒家的形上学，恢复儒家的“形上智慧”。

本世纪初，后来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美学家之一的王国维，在对哲学（特别是康德和叔本华哲学）用了一番苦心之后，表示要“由哲学而移于文学”，以便“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因为“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

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①

这种“可爱”与“可信”之间的矛盾冲突表明了一种生命存在意义上的困惑和分裂，可以说，近代以来好学深思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程度不同的感受到此种困惑和分裂，并致力于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谋求二者的统一。事实上，任何哲学家都不会在“可爱”与“可信”之间简单地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他们总是倾向于由一方面出发去统一另一方面，所以问题的实质即在于：是由“可爱者”推出“可信者”呢，还是由“可信者”推出“可爱者”？这种真与善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及其哲学家们对此所做出的不同的（乃至相反的）说明和回答，在某种意义上，就构成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的相互冲突和对立。在中国近现代，此种冲突和对立又是与旧的价值系统的解体和新的价值观念的引入联系在一起的。

科学主义的观念对中国发生的影响，最初是表现在历史观方面。当人们把西方的进化论作为一种历史观来接受时，其中就隐含着这样一种信念，即：在统治自然领域的自然法则和支配社会领域的社会法则之间，没有什么质的差别，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前者来认识后者。这里用不着更多的理论概括和“升华”（像某些学者所着力论证的那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一条普遍法则，被认为既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而这一法则的权威性则来自科学。这样一种理论及其隐含的信念，帮助中国士大夫打破了历史循环的观念，而代之以一

^① 王国维：《三十自序》，《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15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1页。